

“假设”“想像”下的“绝无可疑”〔*〕

——管窥《朱熹的历史世界》的写作悖论

许家星

(北京师范大学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摘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具有独特的写作风格,该书频繁采用假设推测、证实举例、心理想像、绝对无疑、夸饰惊人类词语,如“假定”“证明”“想像”“铁案”“划时代”等,来对道学文献加以政治化解读,强调道学的外王中心论。但其对材料的使用和解读,实已饱受质疑,颇显疏漏。全书本立足于充满假设想像的探索性、主观性写作,但作者却往往作出决然无疑的断定,这与作者追求的平心而论、历史客观性、非绝对性的治学要求实为相背。

〔关键词〕《朱熹的历史世界》;假设;想像;绝对性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12.004

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以下简称《朱熹的历史世界》)是一部充满魅力的书,该书提出了关于宋代思想史诸多富有见地的大论断,这些论断需要史学、政治学、哲学、宗教学、文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学者长期地学习、消化。其魅力不仅表现为论域广阔、论断新颖,更体现在其独具个性的表达风格中。葛兆光、邓小南、王汎森、祝平次等皆赞誉该书考证精密、解析独到、想象丰富、对话亲切、推理严密。^{〔1〕}但也有质疑的声音,如徐波认为该书虽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然具体解读存在问题,采用设防式写作,即先给出预防对方批评之态度,接着提出对对方的批评观点。^{〔2〕}成玮等直接批评该书存在字词含义、语段脉络、史料性质、推论程序等四方面问题,且不满其在疑似推论中过于自信笃定的权威口吻,认为非学者所宜。^{〔3〕}杨俊才、田吉在指出其考据失误的同时,也认为其方法上存在“论证满纸而证据薄弱”之感。^{〔4〕}

以下我们将考察该书若干具有特色的用语,即假设、证实、想像、断定、夸饰诸类,来管窥该书的写作风格,认为其立足于假设想像的主观性写作与决然断定的客观性追求之间存在不协调性。

一、假设推测类用语

假设本来就是一种心理推断,它既指向历史事实的推测,也指向人物心理的假定。假设、猜想是

作者简介:许家星,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朱子学综合研究”(22VRC173)的阶段性成果。

对未知事实、心理的一种推测性判定,带有不确定性和探索性,它需要得到事实的验证,存在与事实相合或相违两种可能。假设本质上是对文本的一种诠释方式,代表了诠释者对文本的理解和对历史事实的认知。假设建立在诠释者前见基础上,是一个据已知推出未知的过程,受制于作者所拥有的与该文本、事实相关的知识素养。就历史研究而言,假设是其必不可少的成分,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蕴含了作者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历史学事实上是一种诠释学,历史事实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尤其所谓心理事实,更是见仁见智。与追问历史事实相随的是对文本内在价值的诉求。这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该书作者既强调他是基于历史主义的客观原则,欲寻求历史的真实,重建失落的环节,但同时也大声反对道学大叙事模式对朱子的诠释,讥笑程颐、陆九渊的体道之言是不可相信的“神话”,“我们必须破除‘返之六经而后得之’或‘读孟子而自得之’这些神话,才能真正开始研究道学起源与形成的问题。”^[5]这种强调士大夫政治文化,突出外王第一序,内圣第二序的外王重于内圣,以治道为中心的“哥白尼式的回转”论,完全主导了作者对文献的解读和概念的理解,使得所有文献、概念都被赋予了政治色彩。这种泛政治化解读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价值取向和理论预设,即强调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性,认为他们具有与君王共治天下,主张虚君,限制皇权,分化君权的主张,证明朱子不是“专制皇权的辩护士或大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达到了为朱子“辩冤洗白”的客观效应。这是该书的预设观点所在。全书所有的假设推测,总归受到这一大立场约束而为其服务。

以下拟考察该书表达假设推测义的相关用语,以此分析其假设与作者立场的内在联系。书中表达假设推测义的词大体有11个:“假设”“假定”“设想”“猜想”“推测”“推断”“推定”“估计”“可能”“大概”“也许”。此类词总计约使用247次,其中“假设”26次,书中“假设”多作名词,如“第一、第二、第三假设”。“假设”被用作动词表达假设义15次。“假定”19次,“猜想”2次,“设想”1次。^[6]兹各举1例:

首先我要提出一假设之说,即《中庸》的发现与流传似与南北朝以来的道家或佛教徒的关系最为密切。^[7]

我假定《中庸》在北宋是从释家回流而重入儒门的。^[8]

我的目的是想找出其中有多少位是和佛教有关系的。这虽不能完全证实我的假设,但毕竟比茫无所据的猜想要踏实得多。^[9]

这三条假设皆与传统观点相对立,强调因为佛老之徒对《中庸》的重视,才激发了后来道学家对《中庸》的关注,以进一步证明陈寅恪提出的道学源于佛老说。这一观点与二程兄弟的“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说、象山“因读孟子而自得之”相冲突,故余英时斥责后者乃是不可信的“神话”,而以《中庸》流传为例来论证道学源于佛老的假设。这一假设当然也遭到现代学者的批评,如杨立华、张培高等。^[10]至于第二、三条的假设和猜想也是要证明士大夫受佛教影响才重视中庸,这一点学者也提出修正,认为不合事实。^[11]

九渊讲《皇极》敛福锡民是代替道教设醮祈福的旧习。这自然是很可信的记录。但是我们看过上面那么多关于“皇极”的文字之后,便不能不联想到这件事同时也和光宗重申“皇极”之说有关。让我依此设想重读他的《讲义》。^[12]

作者在文中已举出杨万里、刘光祖、周南三例的基础上,设想从政治背景解读象山论皇极,作为光宗重申“皇极”说的又一例证,目的在于证明“皇极”是光宗朝最高的政治纲领,是道学集团和官僚集团政治斗争所在,以强调“皇极”的政治意义。关于此点,已有学者指出皇极首先还是经典解释和学术问题,是帝王教化和地方教化问题,而不一定是政治问题。^[13]

“推测”29次、“推断”22次、“推定”2次、“可能”49次、“大概”55次、“也许”34次。兹各举1例说明。

我们可以推测他大概已有意把“内圣”和“外王”两个领域贯通起来,在取径方面与张载、二程甚为接近。但他虽注重“内圣”的成就,最后的目的还是要重建“尧、舜之道,文、武之治”。^[14]

作者推测王开祖的思想具有内圣外王的贯通性,且指出其关怀重心在治道。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内圣外王”这一用语几乎并不为宋儒所用,对内圣外王这一解释框架的合理性值得反思,学者特别批评其外王第一序,内圣第二序论。^[15]

我推断孝宗退位前有意建立一个以理学习型士大夫为主体的执政团体,除旧布新,然后由光宗继续推行下去。^[16]

本条是作者的一个重大假设,即主张孝宗朝存在理学集团和官僚集团的对立。这一说法遭到不少质疑,认为存在标准不明、难以划清界限、证据不足等问题。^[17]

此条提及史浩(1106—1194)为“普安府教授”,我们可约略推定赐宫女的时间。^[18]

作者根据周密的《齐东野语》“高宗立储”条推定高宗赐宫女考验孝宗的时间,其实《齐东野语》作为笔记不是完全可信的,充满了文学色彩和作者个人偏见,如他对“道学”的描述即颇有侮蔑之词。而全书9次引用《齐东野语》作为证据。

程颐很可能读过这篇文章。^[19]

这条以“很可能”推测程颐读过石介的《贵谋》,由此推断道学与古文运动的渊源,受到三先生“推明治道”思想的影响,同样以治道为中心。其实朱子说得很清楚,二程的道学超越了三先生之学,三先生之学并未见道。余氏选料有意识选取有利者,而未顾及反面材料。^[20]

安石(1021—1086)长于神宗(1048—1085)二十七岁,在这个少年皇帝面前,他大概常以师道自居。^[21]

本条推测王安石与神宗的关系,以突出王安石的自尊意识,强调他对于提高宋代士大夫自尊感的贡献。这种推测显然是有作者的价值预设在内的,即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

高宗也许仍然将三十岁左右的孝宗和伯玖看作“小孩儿”,正如孝宗后来在光宗四十一岁时还说他“孩儿尚小”一样。^[22]

这条以“也许”来推测高宗对孝宗不放手的态度,以印证孝宗认同危机和心理挫折的根源在高宗。“孩儿尚小”这种父子之间表达关系的习惯性称呼,并不等同从心理上把儿子看作“小孩儿”。这种对历史人物心理揣测的可信度是令人怀疑的。

二、证实举例类用语

假设的下一步是论证,作者使用了“证明”41次、“证实”89次、“举证”2次、“举例”4次、“例如”5次、“例证”21次、“实例”19次、“一例”30次。如“证明”条:

又考之《墓志铭》,赵善悉知江州出于丞相王淮的任命,则此事必在淳熙十年六月陈贾“请禁伪学”之后不久。所荐许、李二人事迹尚待再考,但这条史料充分证明了当时一般地方官对于稍涉“伪学”之嫌的人是“畏不敢举”的。^[23]

此“充分证明”已被学者证误,盖其把所引叶适《赵公(善悉)墓志铭》“在江西,荐许中应、李肃,皆善士,时所谓伪学,畏不敢举者也”年代误判为赵善“知江州”时,其实乃是庆元二年他任江西通判时。此处“伪学”指庆元党禁时期,而非淳熙十年。^[24]又“证实”类:

《答陈同甫》书屡次提到“密旨”、“心法”，这是关于尧、舜、禹对“道体”掌握的一种描写。这更证实了前面的观察：朱熹在讨论“道统”时，特别突出“道体”的首要性。^[25]

“密旨”“心法”并不等同“道体”，所谓证实，完全是作者的自我诠释。又“举证”类：

初步检查史料，至少其中七人与佛教有密切关系。兹依出场顺序，举证于下。^[26]

此意在找出进士主考官与佛教的关系，以证明佛教对儒学的影响，学者已经指出其举证其实还是有所遗漏。又“举例”类：

我们不能空谈道学家以重建秩序为中心关怀而不举例以实其说。《西铭》则将他们理想中的人间秩序具体地呈现了出来。^[27]

此例其实并不能证实道学以重建秩序为中心，在朱子看来，《西铭》的核心是理一分殊。

例如杨万里淳熙十六年自筠州赴行在奏事，其十月初三日《上殿第一劄子》之末云：臣愿陛下建皇极于圣心，酌大公于天下。^[28]

以杨万里劄子“建皇极于圣心”为例，证明“皇极”作为政治话语集中出现于光宗朝。又“例证”类：

《中庸》在宋初的流传状况便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29]

此以《中庸》为例，证明佛教徒对儒家经典的深入影响，该说已遭到质疑。^[30]又“实例”类：

这种肯定自南北朝已见端倪，至北宋而更为显著。概说止于此，下面转入实例的印证。前引二程语录“昨日之会，大率谈禅”条末说……^[31]

此条是要以“昨日之会”为实例证明佛教与儒学同样肯定“此岸世界”，强调秩序重建，强调佛教是儒学复兴的功臣。学者对此多有质疑。又“一例”类：

为了说明朱—黄道统论的实际影响，下面让我从元、明两代中各选一例。^[32]

以所谓元代杨维桢、明代刘宗周的道统与治统来证明朱子和黄榦所未提及的治统并无说服力，此是以后人证前人说。

三、心理想像类用语

大量使用心理用语，是《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一大特色。该书除在“孝宗晚年部署”部分明确采用心理史学之外，在其他地方也使用了心理学词语，包括“心理”“想像”“联想”“想法”“意识”“认同”“透露”“流露”“相信”“期待”“信任”等，约计720次。^[33]

“心理”212次，涉及孝宗、孔子、程颐的心理等。

据《年谱》，此文作于天圣六年，适在赐《中庸篇》的第二年，则此事在他的心理上所发生震动之大，可以想见。^[34]

认为赐《中庸》这么一个外在事情，会对范仲淹这个人物心理产生极大影响，恐不至于。

“想像”26次，如：

以程颐的敏感，石介文字曾对他发生过类似的刺激，是不难想像的。^[35]

程颐是否读过石介的文字都只是一种可能的想像，故所谓“刺激的不难想像”更是想像之想像。

“联想”9次，表明两个观点之间的联系性，以为论证，属于推论。

从字面说，宋与汉、唐并称“后三代”最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汉、唐作为大一统王朝的特征，如国力强盛、疆域开拓之类。^[36]

这个以汉、唐、宋作为“后三代”，确实是联想，遭到了学者们的质疑。

“想法”9次,推测古人的想法不是件容易的事。如:

仅读此一条,便可知朱熹绝不能有“四民异业而同道”的想法。^[37]

作者引朱子弟子家贫经营买卖是否妨碍学道之问,朱子认为为谋生并无妨碍,并以象山家开铺子为证。但作者的解读恰相反。

“意识”144次,作者喜欢用今人的意识替古人考虑。如:

如果用现代观念作类比,我们不妨说“以天下为己任”蕴含着“士”对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处理有直接参预的资格,因此它相当于一种“公民”意识。^[38]

作者提出士大夫的“以天下为己任”是一种明朗化的直接参政的公民意识,恐怕是一种现代投射,这种意识应该还是精英意识。

“认同”135次,近20处是指“认同感”等。

从现代人的历史知识出发,我们的认同在陈而不在朱,这是毫无问题的。^[39]

作者根据现代人的历史知识,表明自身认同陈亮的事功历史观而非朱熹的道德历史观。

“透露”55次,有不少与心理有关。如:

朱熹竟在不经意处透露出他内心的想法:孔子以下“道学”的中心关怀也仍然是“治天下”。^[40]

这个朱子内心想法的“透露”显然是作者自己解读出来的,并不合乎朱子的想法。他用“透露”这个词技巧高明,把作者的主观解读转换为对象现身说法,视为对象自己的想法。

“流露”13次,如:

事实上,像裴思谦中状元后的行为也未尝不可看作是一种潜在的反抗意识的流露。^[41]

作者把认为裴氏中状元后的行为想像为反抗意识。

“相信”49次,是一表达主观心理色彩很强的用语。如:

以“道体”言,他奉“伏羲为道之祖”,但以“治天下”言,尧才是建立“道统”的“第一个圣人”。我相信,这也是熊铄的基本看法。^[42]

这个“相信”与熊禾自身想法不合。熊禾并无道体与治天下之分,他的道统论也推举伏羲为首。

“期待”41次,要推测古人的心理期待如何是颇为冒险的事。如: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得君行道”的范例在他们心中仍时时激起一种憧憬的情绪,使他们不知不觉中对孝宗抱有神宗第二的期待。^[43]

作者认为道学家抱有与王安石同样的政治期待,并投射于对孝宗的期待,其实道学家更重视正君、化君。

四、绝对无疑类用语

该书在采用“假设”类用语后,往往紧接着不容置疑的“断定”语。它充分采用了这种设问与回答形式,全书表示绝对断定语气用语之丰富,为笔者有限阅读所仅见。

该书采用的表示绝对的断定语气词包括:“绝对”“完全”“必然”“必是”“必然是”“明明是”“当然是”;“断定”“肯定”“判定”“一定”“百分之百”“十足”“定讞”“断言”“答案”“断案”“铁案”;“确是”“确切”“确证”“确解”“确诂”“确然”;“清楚”“清清楚楚”“明白”“昭然若揭”“若合符契”等;还采用了反问词、否定词,以突出这些断语的不容否定和怀疑。如“岂不”“难道”“不可能”;“无疑”(“确立无疑”“确切无疑”“皎然无疑”“毫无疑问”“断然无疑”“判然无疑”“可以无疑”)“无可疑”“无可怀

疑”“无可置疑”“无可争辩”“无可否认”“无论如何”。这数十个表达断定语气的词在全书中数以千计(约1060次)地出现,充分体现了作者自信的心态和强势的话语权,与假设所表达的探究、咨询语气形成鲜明对照。

语言不仅仅是言说,更是行动、指令,是作者心态的体现。该文大量的绝对语气词透露出作者对其所言具有十足自信,确信对研究对象具有透彻理解,自家所言乃是无可怀疑之真理。作者这种绝对自信的态度对作为接受对象的读者,则会产生心灵上的震撼,产生认同、屈服感,被作者所感染、同化。如“无可置疑”“无可怀疑”“无可争辩”等用语传达了强烈的不容质疑、不容争辩之意味,实与虚心讨论、自由思考、积极怀疑的学风相抵触。在通常的写作要求中,因其具有武断的嫌疑,并不鼓励出现此类绝对性的表述。作者作为文章高手,全书连篇累牍地使用此类用语充分显示出作者对独家发明的“哥白尼回转”的自得自信。

以下逐一举例论之。“绝对”约61次,与名词连用者,如“绝对精神”等约35次,与动词连用者约26次。如“绝对断定”:

《答李诚父书》中之“守此一言”必指“正心”两字无疑。这样我们便可以绝对断定:《答刘晦伯》与《答李诚父书》乃同时所作,皆紧接在李诚父来书及附寄轮对文字之后。^[44]

本条根据王淮代表的官僚集团与朱子代表的道学集团之对峙,来推论朱子《答刘晦伯》与《答李诚父书》系同时所作,认为“可以绝对断定”在王淮死讯传出之前,以证明道学内部信息意见之交流,即对“得君行道”的期盼。按:顾宏义以《答刘晦伯》十一书为“约撰于淳熙十六年秋初”,^[45]认为《答李诚父书》“约撰于是年秋间”。从语气来看,乃是大约推测,非余氏断然肯定之辞气。其实,“守此一言”乃是李诚父轮对文字,究竟何所指,并不能断定。且“守此一言”的“一言”确切内容,也不等于“正心”二字,如果是朱子之说,则是“正心诚意为修身之本”之意,且朱子并不认为李诚父的思想就是纯正的道学,而是“盖首论正心,近似道学”。故朱子对他叮咛告诫,担心他内外隔截。^[46]“完全”268次,表达绝对义约228次,另有近40次并非用作正面的确定语气,而是“不可完全置之不论”这类留有余地的用法。“必然”57次,表绝对义约46次。

我们可以完全承认,通过微观的检视,纯“道学”型或纯职业官僚型的个人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也许根本不存在。^[47]

职业官僚群在任何时期都占士大夫中的绝对多数,这是必然而且正常的情况。^[48]

这两条与两个集团划分有关。第一条以“完全承认”的退步语气,表明所谓纯粹的两个集团划分在朱熹历史世界的不可能。即这个划分只是从宏观角度而论,而且立场会变化,并不固定。第二条是说职业官僚群体居于多数,是一种“必然而正常”的现象,但朱熹向他们发起了批评,以证明存在两个集团的对立。但关于两个集团是否存在,学界却多有质疑。

与“是”相关的有,“必是”“必然是”“明明是”“当然是”,共约88次。“必是”约41处。“必然是”2次,“当然是”29次。如:

韩维原诗确为“戏示”之作,与“湖上独酌”之题完全不合,必是编文集者弟冠兄戴,并妄改“正叔”为“伯淳”,决可断言。^[49]

此条连续采用“确为”“完全不合”“必是”“决可断言”四种断定词,来表达作者的新发现。但学者已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韩维之诗是写给程颐的。因韩诗存在不同版本和异文,正如余氏所言,要断定《酬韩持国资政湖上独酌见赠》诗属于“大程或小程,又是一疑案”。该诗在《程氏文集》卷三归于程颐,诗末注引韩维原诗题曰:“湖上独酌呈范彝叟朝散、程伯淳奉议”。在《南阳集》中又题为写给小程

子,“戏示程正叔、范彝叟,时正叔自洛中过访”。但《南阳集》版本本身即存疑。仅就诗歌自身意境来看,“对花酌酒公能乐,饭糗羹藜我自贫。若语至诚无内外,却应分别更迷真”,则颇似程颢思想风格。故学界多归为程颢所作。余先生的“必是”之论给这一“疑案”所下“断言”恐未能就此了断这一悬案。^[50]

赞宁于“清泰初(934)入天台山受具足戒”(《小畜集》卷二〇),则当属天台宗。……本传特别记载孙何“著《驳史通》十余篇”。这必然是受了赞宁《非史通》六篇的直接影响。我为什么敢如此断定呢?因为孙何是王禹偁淳化三年(992)知贡举所取的进士。^[51]

此条认为孙何的《驳史通》“必然是”受到赞宁的影响,根据是当时录取他的考官是王禹偁,而王禹偁对赞宁推崇儒学很是赞赏,加上赞宁写作了《非史通》,故孙何的《驳史通》当是来自赞宁的刺激。这里的关键是王禹偁是否确实发挥了沟通赞、孙的中介作用。也有学者指出,余氏以赞宁入天台山即为天台宗之说有误。^[52]

除掉“官”字,原诗便成了“惠和尚小师达禄须干”,确像是胡僧的名字,所以可笑。这当然是因为他平时好谈论佛的缘故。^[53]

此条意在以刘筠作为考官,来证明士大夫与佛教的关系。作者根据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所载刘攽《贡父诗话》记“偶自谐和,语涉轻薄”的玩笑之语,遽然断定刘筠“当然”好谈佛。此材料真实之意,学者提出了不同理解。^[54]

这明明是驳正张载的“大轮回”的理论,不过没有指名而已。^[55]

作者认为程颐以日新和生生论气,意在驳斥张载气之聚散说,认为这是“大轮回”。他把程朱批评张载的“轮回”理解为佛教之“轮回”,其实张载是以气之聚散辟佛老,朱子明确说:“横渠辟释氏轮回之说。然其说聚散屈伸处,其弊却是大轮回。盖释氏是个个各自轮回,横渠是一发和了,依旧一大轮回。”此两“轮回”字同意异,佛教是生死轮回,横渠是气之聚散循环轮回。

与“定”有关者,如“断定”“肯定”“判定”“一定”“百分之百”“十足”“定讞”“断言”。其中“断定”约82次是作者断定,如“百分之百断定”。

我们可以百分之百断定,“邪气”两字必出于葛邲之口。他在“太子参决”时期已积极联络官僚集团,阻挠理学集团的“荐士”活动。^[56]

黄榦《朱子行状》提到,“会执政中有指道学为邪气者,力辞新命”,所谓“执政”为谁?王懋竑认为是施师点、萧燧,认为周必大、留正必无此语。余英时指出其系年有误,认为当时执政者为:左相周必大、右相留正、参知政事王蔺、同知枢密院事葛邲。他的根据是:“前三人都是孝宗部署的执政领袖,绝不可能‘指道学为邪气’。只有葛邲一人是光宗的东宫僚属,最为亲信”。^[57]束景南在《朱子大传》中则认为是留正,而许浩然认为是周必大,他认为周必大、留正对理学的态度在发生变化。^[58]无论如何,余先生的推测恐怕还不至于达到“百分之百”的地步,正所谓人心难测,更何况余先生的论断是建立在两大集团斗争这一大推测基础上的!

“肯定”约25次,“肯定”表达绝对的意味相对不是那么强,但有时也很强烈,这往往和诉说者的语调有关。

以上这些第一手证据指向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二程道学是在与安石“新学”长期奋斗中逐渐定型的。在这一奋斗过程中,道学中必有许多或大或小的痕迹可寻,这是可以肯定的。^[59]

这条“可以肯定”的是二程道学与王安石新学的关系,强调新学对道学的影响,认为道学是在与新学的奋斗中形成。他根据的是程颐对王安石的数条评语。道学与新学自然有联系,但这种联系是否

如余先生所强调的是“长期奋斗”的“历史事实”，则遭到学者质疑。二程思想主要还是内得于己，独立形成，外在环境（对手）只是助缘而已。

“判定”2次，此语体现作者颇有喜欢当审判官的意味，该书可谓判案无数。

就我所接触到一切史料作一整体性的观察，我判定反“道学”壁垒基本上是由职业官僚型的士大夫构成的。^[60]

作者判定“反道学”由职业官僚化的士大夫构成。此处“反道学”显然是从政治上论，若就思想而言，有学者认为叶适也是反道学，但叶适自己在政治上又属于“庆元党禁”的对象。已有学者指出他对道学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划分有误。^[61]

“一定”表断定义约4次。如：

可知陈傅良也一定有过与陆九渊相同的经验。^[62]

余氏的意思是说陈傅良也和陆九渊一样，感到朱子门下过于高调，引发了他人对道学的攻击。余氏未曾交代所引版本，当是出自四库全书本一系，引文有缺漏，致解读有偏。他如此表述：

陈傅良《答赵南》也说：某衰惰，久无强附士友之意。……晦庵门人真有学者而不相亮（谅）者。……虽然，吾党亦有患：自相推尊，患太过；与人无交际，患不及。二者皆孔子所戒也。（《止斋集》卷三八）^[63]

据清同治光绪间瑞安孙氏诒善祠塾刻永嘉丛书本《止斋集》，原书“赵南”当是“赵南纪节推”（元脱三字，据目录补）；“不相亮者”后为：“云（元缺，从陈本）云，特未并合耳。”“与人（人下元有‘无’字）交际患不及”。^[64]可知“晦庵门人”下有“云云”二字，明指赵南纪之说，并语带劝告，指出此乃是因为彼此未能“并合耳”，不可理解为是指陈傅良的遭遇。“与人无交际患不及”应无“无”字，“交际患不及”更合文意，指待人不够。

“定讞”1次，如：

对照之下，《中庸序》的“道统”论述是以此书为底本，已可以定讞。^[65]

余英时的“此序”指朱子《答陈同甫》第八书。他未注意朱子癸巳《中庸集解序》才可能是《中庸章句序》的早期底本。

“断言”约23次，如：

不但宰相往往视“国是”为进退，皇帝也要对“国是”负责。高宗在这一年的六月禅位于孝宗与当时“国是”危机必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可以断言的。^[66]

这个“断言”的前提是所有政治人士都要为“国是”负责，包括皇帝在内。如此的话，“国是”成为制约君权的一条绳索了。但有学者则认为，“国是”不过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不可能是限制君权的利器。^[67]

与“案”有关的有：“答案”“断案”“铁案”。“答案”21次，如：

整体地看，这“三先生”的儒学共同特征是什么？幸运得很，朱熹居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清楚楚的答案。^[68]

作者据此引朱子赞三先生“推明治道”的话，进而推出，既然三先生的精华在推明治道，而此又是道学之源，故“推明治道”必然仍是道学的中心关怀，进一步由此推出“哥白尼式回转”的必要性。作者的表述很有文采，接连采用了“幸运得很”“居然”“清清楚楚的答案”，与读者积极分享读到此则材料内心的无比喜悦。可惜他忽视了朱子对三先生未曾见道的批评。道学的中心乃是成就圣贤。

“断案”7次，如“历史断案”说：

“后三代”的概念中,文化成分重于政治成分,大致可以断定。宋代在政治史上虽不能和汉、唐争辉,但在文化史上则有超越汉、唐的成就。这一历史断案是通过长时期的讨论而逐渐形成的。^[69]

此断案说提出了汉、唐、宋的“后三代”论,学者已提出质疑。^[70]

“铁案”1次,如:

“六和塔”即指浙江亭,可谓铁案难移了。^[71]

可惜这个“铁案”已经遭到学者质疑,极有成为冤案的可能。^[72]

与“确”有关的约93次,“确是”“确切”“确证”“确解”“确诂”“确然”。

“确是”55次,如:

“士人尊《西铭》过于《六经》”确是事实。^[73]

此说乃林栗有意之说,意在否定《西铭》,故采取先扬后抑的方式,余氏则认为“确是事实”。

“确切”17次,如:

我们必须在概念上作根本的调整,然后才能确切把握住“推明治道”在宋代所谓“道学”或“理学”的中心意义。^[74]

如前所述,“确切”把握的“推明治道”并非道学的中心任务,成为真儒才是。程颐在给明道的《行状》中“无善治”和“无真儒”有明确的对比性解释。

“确证”14次,如:

《鐔津集》卷二二有《又序》一篇,未署名,编者疑是“莹道温”所作,即其确证。^[75]

余氏认为《鐔津集》中《又序》编者莹道温,学者早已指出此说不确,乃是惠洪。^[76]

“确解”3次,如:

《答陈同甫》书说:“此其相传之妙,儒者相与谨守而共学焉,以为天下虽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这句话便是《中庸序》中“道学”两字的确解。^[77]

余氏认为朱子答陈亮书中这句话是“道学”的确解。从字义来看,这句话是说“相传之妙”,儒者应谨守而共学,天下虽然广大,但用以治理天下的原则、方法即在其中。关键是什么是“相传之妙”,这句话并没有透露,其意义并不清楚,更不可能作为“道学”的确解。

“确诂”2次,如:

在这个意义上,“道统”是“道”在人的世界的外在化,也就是“放之则弥六合”,内圣外王无所不包。所以“道统”之“统”与孟子所谓“创业垂统”(《孟子·梁惠王下》)之“统”是相通的。这是《中庸序》中“道统”二字的确诂,毫无可疑。^[78]

他认为孟子中“垂统”即《中庸》之道统,朱子把“创业垂统”解为:“然君子造基业于前,而垂统绪于后。”“统,绪也”。余先生认为朱子的“统”也包括了“业”,是道的外在化,以此作为道统之义。如此,则孔子以下的颜曾思孟、周程(包括朱子)道统谱系中人,何人因其功业而把道在人的世界外在化了?

“确然”2次,如:

“收召群贤,一新庶政”确然抓住了赵汝愚和理学集团的基本动向;这是他们企图落实孝宗的晚年构想。^[79]

作者据樵川樵叟的《庆元党禁序》,认为文中所引八字抓住了理学集团的动向和孝宗晚年部署。其实从这八字及其下文“宫府之间,近习窃柄”来看,仍然是朱子反复言说的“反近习”之争,而并不一

定是作者所设想的孝宗晚年部署。

与“清楚”有关的用语有，“清楚”“清清楚楚”“明白”“昭然若揭”“若合符契”，约 143 次，这些用语大体同意，表明历史材料之意义在作者眼中是非常清楚自明的，而在常人那里则非如此，显示出作者的高超能力。

“清楚”96 次，如：

宋代党争性质与东汉、中唐、晚明的党争都不相同，它很清楚地打上了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烙印。^[80]

“清楚”是说宋代党争体现了士大夫政治文化，根本就在“国是”法度化，对此学者已提出批评。

“清清楚楚”5 次，如：

这实在是一番很精到的心理分析，把光宗的“意我”作主和“把定”心态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上引诸臣谏言，无一人曾及此义。^[81]

作者先引朱子给光宗封事中的一段话，认为其中有很精到的心理分析。朱子之说意在同情地剖析光宗不愿去拜见孝宗的心理原因，试图站在光宗立场上加以解释，把他不见孝宗的原因推向众臣而非光宗自身，认为是光宗感到受了众臣的冒犯和胁迫，故不去。

“明白”36 次，如：

过去我们不理解他为什么单单挑出《儒行篇》来予以痛斥。现在我们完全明白了，这是针对太宗淳化三年赐进士《儒行篇》而发。^[82]

余先生先引程子批评《儒行篇》的话，然后提出“完全明白”论，其说还是从外在事件论述。程颐的批评是从内容论“《儒行》之篇，此书全无义理，如后世游说之士所为夸大之说”。程子显然是从义理判定《儒行》，所谓“完全明白”也只能是余先生的别有会心。^[83]

“昭然若揭”4 次，如：

经过以上的分析，官僚集团本身自有其政治企图，并且主动地争取其实现，其事已昭然若揭。^[84]

所谓“官僚集团”这个说法本身存疑，至于所谓政治企图，逼迫皇权就范等更是推测之辞。

“若合符契”2 次，如：

两文互勘，若合符契，不过绍翁客观叙事，樵川樵叟则作道德谴责，故语调不同而已。前者说侂胄“谋之某官”，后者说镗“纳交于侂胄”，究竟何方主动，似难确定。^[85]

“两文互勘”是指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和《庆元党禁》有关韩侂胄、京镗构成反道学集团的记载，有学者对京镗的立场提出异议，认为他其实维护了道学，对京镗的刻画是出于道学的历史偏见。^[86]

通过否定语气词来表达强烈断定语义，有“岂不”“难道”“不可能”，约 141 次。

“岂不”19 次，如：

如果朱熹关于“无极而太极”的构想竟没有把“皇极”包括在内，则所谓“太极之全体”云云岂不完全落空？这似乎是无法想像的事。^[87]

事实上，朱子的《太极解义》及相关解释中并无“皇极”，朱子在早期处理太极，皇极是朱子后期关注的话题。

“难道”10 次，如：

为什么朱熹非置《大学》于“四书”之首不可呢？难道仅仅因为他必须遵从程颐的教法吗？^[88]

这个“难道”是无的放矢,这个“首”朱子已经有明确解释,是次序而非首要之义。朱子对四书系统性的理解超过二程。

“不可能”114次,如:

他们也不可能是直接从韩愈、李翱的文字中得到了启发。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类的说法都不免舍近求远,不着边际,与思想史的一般进程太格格不入了。^[89]

事实上,韩愈的《原道》对理学影响颇大,《孟子集注》序言部分引其说多条,朱子对《原道》未论及《大学》格物颇不满。至于李翱的中庸解,朱子在《中庸集解序》中专门论及。所谓“不可能”得到启发是不合乎事实的。

与“无疑”有关的有,“无疑”“无可疑”“无可怀疑”“无可置疑”“无可争辩”“无可否认”“无论如何”等,约158次。这种以“无”开头的表达式从否定入手,较之“必然”等肯定方式,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更加体现了作者对自家观点的得意、自信。

“无疑”50次,用词特别生动多变,包括“确立无疑”1次、“皎然无疑”1次、“断然无疑”2次、“毫无疑问”4次、“可以无疑”3次。“确立无疑”如下:

但朱熹将孔子所传与周、程所继者称之为“道学”则至迟在淳熙十年(1183)已确立无疑。^[90]

学者已考证,朱子肯定周程道统之传比1183年更早,至少在1179年已提出。“皎然无疑”如下:

“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这句话则是对孔子以下的“道学”所做的描述。程颐在这里将“道学”的主要内容规定为“明夫善治之道”,也皎然无疑。^[91]

查程颐原文即可知,所谓“善治”,乃是与“真儒”比较而言,以突出明道之真儒的重要。“断然无疑”如下:

孝宗绍兴三十年为皇子时已“骑射翰墨皆绝人”,则他为了“恢复”曾作过长期的准备。综合各方面史料,他的最后认同是“恢复”,断然无疑。^[92]

孝宗晚年的认同是否是“恢复”,应该考虑他一生来看,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认同”是个心理问题,不能说是“断然无疑”。“可以无疑”如下:

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周益公参大政,朱文公与刘子澄书云:“如今是大承气证,渠却下四君子汤,虽不为害,恐无益于病尔。”(甲编卷二“大承气汤”条)所引文字不见于现存朱熹与刘清之诸书中,但其真实性可以无疑。^[93]

按:罗大经所言“与刘子澄”恐误,恐是“答吕伯恭”,该书言:“新参近通问否?大承气证却下四君子汤,如何得相当?然尚幸其不发病耳。老兄与之分厚,须痛箴之”。新参即周必大,于1180年拜参知政事。“毫无疑问”如下:

即以最有代表性的理学家如朱熹和陆九渊两人而言,他们对儒学的不朽贡献虽然毫无疑问是在“内圣”方面,但是他们生前念兹在兹的仍然是追求“外王”的实现。^[94]

这句话典型体现了该书的表达风格,为证明外王中心论,作者经常采用“虽然,但是”的转折句型,以表抑扬之意。“虽然毫无疑问,但是仍然是……”,难道理学家的不朽贡献与其念兹在兹的追求相异吗?

“无可疑”42次,其中“毫无可疑”17次、“绝无可疑”9次、“决无可疑”4次。“毫无可疑”如:

这个“立其本”即指《皇极辨》中所谓“立至极之标准”,毫无可疑。^[95]

作者以朱子“常谓天下万事,有大根本”,“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的“本”为“立至极之标准”不妥,“大根本”乃是朱子多次言及的“格君心之非”。

“绝无可疑”，如：

懋竑过于谨慎，不肯采信。其实此语必本于旧谱，绝无可疑。^[96]

作者批评王懋竑太过谨慎，不信《洪谱》“峻林栗极论之”说，盖余氏极力就此论证林栗被纳入王准的反道学集团。但学者认为，林栗并非反道学者，故此语未必如作者所论“绝无可疑”。^[97]

“决无可疑”，如：

这一条的史源虽尚待考，但出于南宋记载决无可疑。^[98]

作者引明田汝成辑《西湖游览志余》的一条宋代旧闻，认为必定来自南宋无疑。但该书本属于武林掌故类。

“无可怀疑”6次，如：

程颐崇敬王通，受到古文运动诸公，特别是孙复与石介的启发，这也是无可怀疑的。^[99]

此说意在说明道学受到古文运动特别是重视治道的孙、石的影响，并推测程颐可能读过石介《贵谋》中“刘备能用诸葛亮之谋，是以抚有巴、蜀”，故对诸葛亮评价颇高。此与二程对诸葛亮的评价恰恰相反，二程是从德性上赞其“近儒者气象”和“近王佐才”。

“无可置疑”9次，如：

政治秩序为当务之亟这一意识贯穿于古文运动、王氏“新学”和道学之中，事实俱在，无可置疑。^[100]

此说把古文运动、新学和道学混而论之，道学的当务之急是“格君心之非”，而非政治秩序。

“无可争辩”4次，如：

“内圣外王”不可分而同归宿于秩序重建，这是无可争辩的。^[101]

这个说法已遭到学者的反复质疑，所以是“可争辩”而非“无可争辩”。

“无可否认”10次，该书所使用的“无可否认”，其实多是有争议而“可以否认”的。如：

朱、王关系自始即如冰炭不相入，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102]

此时论朱熹与王准的关系，认为开始即紧张不和。学者已证明朱、王在淳熙九年之前关系融洽，只是因唐仲友事件才变化。^[103]

通过条件、让步关系的“无论如何”表达绝对的语气有45次，如：

无论如何，从张载、程颐到陆九渊，理学家通过种种曲折方式企图一方面抑制君权，一方面伸张士权，则是显而易见的。^[104]

道学家的抱负在“正君心”而非“抑君权”，更无“虚君制”的想法，不能将现代政治观念强加古人。

五、夸饰惊人之语

该书喜用夸张性词语，包括“划时代”“石破天惊”“空前绝后”等，以表达作者对某些材料所蕴含思想意义的惊叹，颇有独发其覆之味。

如“划时代”用了21次，在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中使用这么多“划时代”是罕见的。

他的“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一语可以说是理学政治思想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用现代的语言表述之，即“治统”的合法性（“legitimacy”，亦可作“正当性”解）依附于“道统”。^[105]

作者判定杨维桢的“道统治统之所在”具有划时代意义，这是从现代政治学角度解读的，其实该论对古人并无甚影响。且比他更早的陈栌已经运用道统与治统说。

“石破天惊”2次，如：朱熹在“党”的问题上更曾发出石破天惊之论：“君子”不但应该有“党”，而

且“惟恐其党之不众”。^[106]

作者根据朱子 1191 年《与留丞相书》关于“朋党”的论述得出此结论,又引朱子提及“洛党、蜀党”之说,认为“证明自熙宁以来,‘党’字在士大夫笔下已成为一价值中立的名词”。^[107]但已有学者指出此实误解了朱熹对“党”的中立性认识。

最后一段说“士”之“道隆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更是石破天惊之论。^[108]

作者引王安石《虔州学记》说,认为加深了北宋以来士大夫与皇帝同治天下的观念,故以此论为“天惊”之语。然学者指出,共治天下乃汉唐以来的共同政治话语,源于孟子,宋代士大夫政治主体地位虽高涨,但此语乃普遍用语,实不足以“天惊”。^[109]

又如“空前绝后”两次,如:

这真是传统政治思想史上一番空前绝后的议论;这反映了朱熹在孝、光两朝的党争经验。^[110]

此是把朱熹的上述朋党论视为“空前绝后”,过于看重朱熹的党争论及经验。

六、反思

以上考察了《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的用词特点,包括假设类、证明类、联想类、绝对类、夸饰类,并举相关例证加以解析。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表达始于假想,经由史料的举例、解释,终于无可怀疑的绝对自信,试图让读者相信其所建构的朱熹的历史世界。该书所运用的一切手段,都是服务于对道学加以政治化解读这一“哥白尼式回转”的根本预设,皆是朝向道学以治道为中心的目的。

令人难解的是,作者的论证基于假设和想像,其所得出的结论应该属于探索性,但出人意料的是,作者却极为频繁地使用极度绝对的词语,来强调其推论的正确性和不可怀疑性。假设的或然性如何与无可怀疑的必然性相融洽呢?早已有学者指出该书文学与历史相结合的叙事方法具有难以克服的主观性。^[111]作者目的化的解读辅之以绝对化的态度,会对读者产生震慑效用,但由于其史料运用和概念解读的主观性,反而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学界已经对其史料运用的问题多有指出,比如在材料运用上,作者多次使用有问题的四库全书本,导致其所得出的结论与事实相背(如涉及刘宗周、陈傅良的两处)。在材料解读上,全书存在只顾其一不及其余的自相冲突处(如涉及熊禾、孙复的两处)。另外,全书行文文明有急促之感,似乎存在著者对所用文献未读终篇(甚至未读,如对陈淳《道学统》的看法)而遽下结论的情况,尤其是未曾考虑反面材料对其结论的不利。这是因作者下笔之前早已成竹在胸,所有的材料不过是用来证明其“哥白尼式的回转”而已。故对材料的真伪及其真实意义,作者似乎并不用心。在作者看来,其所精心挑选的材料都是服务道学政治化这一宗旨的,必然可靠。其确认的道学必然以治道为中心,必然与“新学”殊途同归、必然受到佛教重大影响,受到科举直接刺激等重大论断,绝无可疑。

其实,作者对其质疑的回应者提出了非常好的治学要求和写作原则。

一是要有仁心、学心、公心。如作者曾评价刘述先对他的商榷文字,认为“大致做到了荀子‘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这几句话。从作者的观点说,我已不能有更大的奢求”。^[112]这也正是读者对作者的期待。《朱熹的历史世界》充满了论辩和商榷,提出了各种新解,对人启发极大,但是文中也出现太多具有独断、霸权色彩的语气(如表达绝对性的词语几乎无页无之,“划时代”出现 20 多次),大大抵消了使读者对该书所论产生“仁心、学心、公心”之感,而时有一种作者欲通过其雄辩迫读者就

范的威权感。

二是史学的客观性。作者强调该书是带有对古人同情理解的史学作品，“我的史学训练不允许我完全抛却对于历史客观性的追求。尽管客观性的观念现在越来越受怀疑，但彻底否定它，我便失去专业的立足点了。所以即使我认同于理学家的‘终极关怀’，我也不能让它走进这部史学专著之中”。^[113] 作者认为，他要捍卫日益遭受怀疑的史学的客观性。但是构成全书基调的假设、想像、推论与这种客观性显然是冲突的，如何保证假想、心理推测的客观性呢？当带着道学政治化这一前见来寻找、解读史料时，如何保证客观性呢？

三是对绝对性用语的反感。作者曾批评其批评者杨儒宾的文字颇多绝对性的用语，“他最后还有一手绝招：在做了他认为绝对不容怀疑的‘断言’之后，往往加上‘大概都可以同意’、‘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大概也没有人会认为’、‘很难否定’、‘这是确切无疑的’之类的话，意在封住别人的口，表示讨论到此为止，不必再往下说了”。^[114] 他认为这种极端用语具有独断论色彩，意图在堵住别人的嘴巴，取消争论。而全书中此类绝对用语的使用较他所批判的对象，实在是远过之而无不及了。

总之，基于假设、想像、推论的历史叙述，如何确保其确定无疑的客观真实性，是该书并未解决的难题。

注释：

[1] 邓小南等：《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读书》2005年第10期；葛兆光：《拆了门槛便无内无外：在政治、思想与社会史之间——读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及相关评论》，《书城》2004年第4期；王汎森：《历史方法与历史想像：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国学术》2004年第2期；祝平次：《评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成大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

[2] 徐波：《历史世界是如何可能的——环绕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之思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葛兆光：《拆了门槛便无内无外：在政治、思想与社会史之间——读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及相关评论》，《书城》2004年第4期。

[3] [11] [54] 成玮：《从释义到推论——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史料解读献疑》，《阴山学刊》2009年第2期。

[4] 杨俊才：《关于姜特立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的定位问题——与余英时先生商榷》，《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葛兆光说：“不过应当承认，当余英时特意凸显‘外王’一脉的时候，批评者却批评他有意忽略‘内圣’一路，并且指出，由于余英时有意强调‘外王’，往往不免要强史料而迁就已说。杨儒宾的批评有他的道理。”葛兆光：《拆了门槛便无内无外：在政治、思想与社会史之间——读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及相关评论》，《书城》2004年第4期。

[5] [7] [8] [9] [12] [14] [16] [18] [19] [21] [22] [23] [25] [26] [27] [28] [29] [31] [32]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7] [48] [49] [51] [53] [55] [56] [57] [59] [60] [62] [63] [65] [66] [68] [69] [71] [73] [74] [75] [77] [78] [79] [80] [81] [82] [84] [85]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8] [99] [100] [101] [102] [104] [105] [106] [107] [108] [110] [112] [113] [114]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93、86、86、89、833-834、119、529、721、115、225、723-724、344、24、90、122、819、93、75、17、88-89、115、185、901、210、19、31、216、34、390、516、348、374、71、96-97、90、101、802、802、54、345-346、500、500、22、280、117、189、557、144、117、78、23、13、670、7、803、93、676、671、180、417、93、14、32、733、514、自序二第11页、180、511、693、113、47-48、867、363、163、17、7、376、225、374、861、870、893页。

[6] 每个用语的频率来自对全书的统计，非绝对精确，通常某个用语在全书中出现的频率会高于用来表达作者真实用意的用例，因为该用语还会出现在引文或对他人的观点的表述中。故本文的频率仅限于表达作者观点的用例。如“假定”在书中出现了30次，真正表达作者看法的19次，“设想”8次。

[10] 杨立华说：“北宋道学的产生，自然离不开具体历史处境中的种种外在的因缘。在历史的视野中重构这些外在因素与道学思想展开的具体关系，无疑是对宋代道学研究的重要补充。但如果因此而将其视为道学产生的内在根由，则不免失之偏颇。而且，对《中庸》在北宋道学产生中所起作用的过度强调，也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尽管在北宋‘真、仁两朝之际’，《中庸》已经开始为士大夫广泛提倡，但其经典地位的真正确立，却是道学运动的结果。换言之，恰恰是道学家们的具体阐发，赋予了《中庸》以核心经

典的地位。而这些具体的阐发,又奠基于道学思想的整体建构。”杨立华:《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2页;张培高:《〈中庸〉地位提升的主因:宋初儒士推崇》,《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13] 陈来:《“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许家星:《皇极与教化——朱子、象山皇极说新论》,《学术界》2021年第1期。

[15] 祝平次:《评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成大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吴震:《对“内圣外王”的一种新诠释》,《国学学刊》2010年第2期;梅广认为“内圣外王”一词对儒学伤害极大,梅广:《“内圣外王”考略》,《清华学报》2011年第4期。

[17] 祝平次:《评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成大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杨俊才:《关于姜特立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的定位问题——与余英时先生商榷》,《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0] 余书引朱子此条,却不引朱子批评三先生“于理未见”条,先生曰:“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然数人者皆天资高,知尊王黜霸,明义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于理未见,故不得中。”[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89-3090页。

[24] 参见代天才:《周必大〈思陵录〉与淳熙末年政局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87页。

[30] 张培高:《〈中庸〉地位提升的主因:宋初儒士推崇》,《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33] 如该书还大量使用“有意”“无意”等词。

[45] 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779页。

[46]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27页。

[50] 张新国主程颢说,还列出其诗之异文,首句为“闭门读易程夫子”,似指程颐。张判定此诗是误改而不可取。张新国:《〈二程遗书〉“昨日之会”节考释》,《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52] 高慎涛指出赞宁实属律宗而非天台宗,见高慎涛:《〈朱熹的历史世界〉所涉佛教史料补证》, <https://www.fjdh.cn/wumin/2009/04/21324864131.html>。

[58] 参见许浩然:《周必大的历史世界——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士人关系之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179页。

[61] 成玮:《从释义到推论——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史料解读献疑》,《阴山学刊》2009年第2期;杨俊才:《关于姜特立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的定位问题——与余英时先生商榷》,《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64] 笔者核对今人整理的《陈傅良集》,以为是编者所校正,后查《止斋集》,原来是余氏所据文本之差异。

[67] [70] 祝平次:《评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成大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

[72] 田吉从以下方面论证,首先,就距离而言,六和塔与浙江亭相距大约八到十里,距离较远,无法相望。六和塔今仍在钱塘江大桥侧龙山月轮峰开化寺内,浙江亭早已不存。其次,《梦梁录》的记载只能证明浙江亭是宰执待罪的地点之一,并不具排他性,南宋宰执待罪之所本非浙江亭一地。田吉:《误将浮云作树林——余英时的六和塔浙江亭考证商榷》,《博览群书》2010年第5期。

[76] 高慎涛指出,“《又序》一般疑为《湘山野录》作者莹道温之作,孰不知此乃惠洪《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三《嘉祐序》,这一问题陈垣先生已经指出,并且叹‘明代僧徒之陋’。另外,我检视《鐔津集》元刻本,发现四部本或大正藏本卷末《又序》位于元刻本之卷首,落款明确题为:‘元符元年中秋日高安沙门德洪序。’德洪即惠洪,此乃又一明证。”

[83] 陈来先生认为,“这个时期的理学家,对赐《儒行》不太以为然;如果赐《大学》《中庸》,理学家们很高兴,道学重视《大学》《中庸》是跟道学之所以为道学的理念是一致的,它不是从现实政治出发,而是要传承已经中断了一千四百年的道统”。陈来:《〈礼记〉儒行篇的意义》,《儒学今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25-226页。

[86] 冯昱渊:《南宋京镗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97] 朱学博:《朱熹林栗纠葛新辨——兼论林栗与道学人士交谊》,《历史文献研究》2021年第2期。

[103] 顾宏义:《朱熹与王淮交游考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109] 顾宏义:《释“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中原文化研究》2023年第3期。

[111] [韩]闵庚旭:《〈朱熹的历史世界〉的叙述结构和论证方式——以余英时对〈朱熹挽孝宗诗笺释〉的评释为中心》,《中语中文》2017年第3期。

[责任编辑:汪家耀]